

# 全球价值链研究 30 年:理论分野与政策变迁

秦升

**内容提要:**全球价值链在实践上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生动刻画,在理论上不仅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成为一系列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底座。本文首先明确了价值增值与价值分配作为全球价值链研究核心概念的重要意义,以此为出发点梳理了全球价值链 30 年的发展历程,包括冷战结束后的飞速发展阶段、金融危机后的缓慢恢复阶段以及新冠疫情后向区域价值链的转移阶段。每个阶段的政策实践都引发了理论发展的分野,包括以产品内分工、FDI、外包为核心的生产组织方式分析;以领先企业、惯例原则为出发点的治理结构分析;以国家与市场关系、安全与经济关系、产业政策竞争为主要逻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范式的分野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和制度基础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也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发展变迁的动力机制。我国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从功能主义的国际视角向锚定中国问题、体现中国意识的发展主义视角转变,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挑战夯实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产品内分工;领先企业;产业竞争;制度赤字

DOI: 10.19851/j.cnki.CN11-1010/F.2024.02.061

全球价值链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以全球价值链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架构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将最终产品贸易作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深刻揭示了与传统国际分工迥异的现代国际分工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带来的巨大影响。

经过 30 年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分析全球经济治理、国家经济增长、国家间经济关系、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等的重要理论工具。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的政策倾向日益显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的制度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削弱(杨丹辉和渠慎宁,2021),全球或区域经济治理正在进入一个瓦解、重构和新创的过程(张宇燕等,2019)。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探索处在同一个关键时点,总结全球价值链过去 30 年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其发展规律和内在动力,明确全球价值链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理论发展路径和研究重点,为中国更好地应对大国博弈、产业政策竞争和制度竞争做好理论准备和政策应对。

## 一、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演变与辨析

全球价值链最早借用了来自管理学领域研究企

业的价值链概念。价值链指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销售、交货和售后服务等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创造过程。Michael Porter(1985)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某些特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活动,是企业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理论的主要关注点集中于企业内部。Bruce Kogut(1985)拓展了价值链理论,其重要贡献:第一,将企业层次的价值链理论扩展到全球层次,在分析上把微观的企业价值链垂直分离与宏观的全球空间分配相结合;第二,提出了价值增值链的概念,为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增值理论提供了思想源泉。Gereffi(1993)提出的全球商品链概念是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前身,并指出围绕某种商品生产而形成的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正在形成,其将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以及零售商之间的跨国互动纳入分析框架。20 世纪末,价值增值和价值分配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核心议题,理论发展所涉及的治理、权力和动力机制研究及其政策意涵都是围绕价值增值和价值分配进行的。然而,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发展并未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仅限于学者的学术讨论。

进入 21 世纪,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重要时间节点,全球价值链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点关注。2013 年,“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出现在联合国贸发会《世界投资

**作者简介:**秦升(1982-),男,汉族,河南正阳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国际政治经济学。

报告》的副标题中<sup>①</sup>，这是国际组织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全球价值链概念。2014年G20部长级会议举办前夕，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OECD联合发布了题为《全球价值链：挑战、机遇以及政策意涵》的报告，肯定了全球价值链对贸易、经济增长、发展、创造就业、增加值创造的积极影响，并使用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来测度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sup>②</sup>。从2017年至2023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IDE-JETRO)等在内的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以及对外经贸大学对报告的发布和撰写均做出了重要贡献，系列报告的时效性、专业性和国际性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全球价值链研究不断走向前台，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政策意涵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普遍关注。

在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过程中，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产业链分工等概念经常相互替代使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理解偏差。

全球供应链指跨国公司在进行全球布局的过程中所关注的原材料、零部件、设备等的流动，以及这些流动过程中的计划、协调、控制和管理。防范风险、提高供应链韧性，是政策层面的主要关注点(Grossman和Helpman, 2021)。近年来，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部分国家采取的“脱钩断链”政策均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Baldwin和Freeman, 2022)。与全球价值链关注价值议题不同，全球供应链更加关注企业经营效率和发展韧性。

全球产业链是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既包括产品的物理制造，与产品相关的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管理、分销和服务等活动，也包括产业的跨国对接和协调，大到国家的宏观经济，小到企业的微观发展，甚至区域和全球性的产业组织、产业协会等都是全球产业链涉及的主体。

因此，只有明确全球价值链以价值增值和价值分配为核心的研究议题，才能区分诸多相似概念，准确捕捉理论发展的脉络。

## 二、制度变革、分工深化与全球价值链崛起

冷战结束以后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生产全球化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主要趋势；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境外包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扩张和创造超额利润的新方式。西方发达国

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为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和跨国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创新使标准化生产、模块化生产和大规模产品内分工成为可能。在上述一系列积极因素的推动下，全球价值链进入飞速发展的轨道。对中国而言，面对全球产业的转移与竞争，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我们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认识全球化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张辉, 2004)。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研究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机制与动力机制、产品内分工、外包和FDI对全球价值链的推动作用，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微观企业层次，鲜有涉及政策因素。

生产过程的空间分离和中间产品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重要基础。价值链从一个国家和企业内部扩展至全球范围，生产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特别是跨国生产是必要条件。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共同推动了生产过程的片段化，即生产过程分散到不同的空间区位(Jones和Kierzkowski, 1990)。生产过程的空间分离伴随全球外包、离岸外包、转包的不断发展，加大了中间产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Arndt, 1997)。随着中间产品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中间产品质量也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依据(王金鑫, 2023)。

“订单制造”的概念较好地诠释了企业跨国经营和生产的過程，即跨国公司以订单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将产品的全部或部分生产环节(工艺设计、产品制造、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外包给其他企业，产品品牌仍然由跨国公司决定，承接订单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Luthje, 2002)，这是最早涉及原始制造设备商(OEM)的研究之一，也从微观企业层次解释了全球价值链的运行机制。

无论是外包还是“订单制造”，都离不开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对全球价值链的推动作用。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延伸为多个连续的生产阶段，每一个国家只在某个连续的特殊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刘志彪和刘晓昶, 2001)。来自产品内分工的研究为理解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产品的生产过程分散到不同国家，工序、区段和环节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研究对象(卢峰, 2004)。在跨国生产链条和分工体系中，每个生产环节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演进。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覆盖范围之广泛，对全球经济结构影响之深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产业转移、市场规模的扩张和技术溢出并

<sup>①</sup>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世界投资报告概述 2013——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EB/OL]. (2013-6).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13overview\\_ch.pdf](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13overview_ch.pdf).

<sup>②</sup>OECD, WTO and World Bank Group. Global Value Chains: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Executive Summary [R]. 2024.

未实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所预测的发展趋同,分工深化与分工固化并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底线竞争”容易使自身陷入贫困化,导致其经济和社会福利大幅缩减(卡普林斯基,2008)。因此,全球价值链给嵌入其中的国家带来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效应展现出了巨大的差距。

### 三、领先企业、惯例原则与全球价值链治理

对全球价值链经济社会效应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企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以及生产收益如何分配?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回答推动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发展。一般而言,全球价值链治理指处在不同价值链节点的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权力结构和相互关系。对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以领先企业为中心的权力研究以及以惯例原则为中心的关系研究。上述研究聚焦于全球价值链的微观基础,关注领先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协调与互动,在理论上为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提供多层次和多维度的解释(秦升,2014)。

#### (一) 领先企业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多重驱动力

领先企业指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特定权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成本、产品标准、交货时间等方面具有强大控制力,能够影响价值链中其他企业的经济行为。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领先企业在选择 FDI 以及外包的地理位置、挑选供应商以及决定附加值高低等诸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一决策及其实现过程成为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重要驱动力。

Humphrey 和 Schmitz (2000) 从权力是否对称的视角区分了 4 种治理模式,包括:市场模式:供应商具备一定的能力且产品能够进行标准化生产,领先企业和供应商相互协作,成本低;网络模式:领先企业与供应商没有明显的地位差距,双方共同决定产品标准;半层级模式:领先企业定义产品标准,高度控制供应商,供应商出现生产问题将导致领先企业蒙受损失;层级模式:领先企业定义产品标准和生产流程,通过 FDI 等方式直接管理海外供应商。

在以上分类基础上,Gereffi 等 (2005) 共同发展了新理论框架,将治理类型从 4 种模式扩展到 5 种模式,更加全面地解释以公司间协调机制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见表 1)。

从以价格为主要协调机制的市场型治理到直接控制和管理的层级型治理,领先企业与供应商之

表 1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治理类型	知识与信息交易的复杂程度	解码交易信息的难度	供应商满足交易需要的能力	权力不对称程度
市场型	低	高	高	低
模块型	高	高	高	↓
关系型	高	低	高	
俘获型	高	高	低	
层级型	高	低	低	高

间权力不对称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全球价值链的五种治理模式有力地解释了领先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知识、信息和技术等因素在不同治理模式下发挥作用的机制。

全球价值链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不对称引发了治理“鸿沟”。当不积极的、无效的或不公平的治理机制出现时,侵犯劳工权利、破坏环境、降低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问题显现出来,作为领先企业的跨国公司被认为是加剧治理“鸿沟”的重要行为体(Schrage 和 Gilbert, 2021)。由于在合同制定、产品定价、交货时间、工资待遇等领域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治理机制,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化对完善全球价值链治理、消除治理“鸿沟”至关重要(Fransen 等, 2019)。除了以跨国公司、供应商为代表的领先企业之外,包括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工会、母国政府、东道国政府在内的行为主体被纳入不同的治理模型,通过借鉴类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体系,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跨学科特点日益突出。

#### (二) 惯例原则、标准制定与全球价值链治理

以驱动力研究为基础的治理理论重点分析企业之间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Ponte 和 Gibbon (2005) 通过引入社会学中的“惯例”概念,从崭新的视角探索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逻辑。新的治理理论根据惯例的分类标准以及对质量的不同定义构建了六种治理模式,包括:①以竞争为原则的市场惯例:价格是质量的主要标准;②以忠诚度为原则的内部惯例:产品规格和质量的定义依赖于长期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和反复合作的历史;③以生产力为原则的行业惯例:由第三方通过强制测试、认证和检验保障产品符合规范和标准;④以福利为原则的公民惯例:基于对共同福利的承诺,产品的生产、营销和出售应当达到一定的标准,以满足公众在安全、健康和环境问题上的诉求;⑤以创造性为原则的启发惯例:以创新和创造能力为核心,强调产品的新奇性和突破性;⑥以声誉为原则的评价惯例:质量取决于公众的认可程度,质量的不确定性问题通过媒体、品牌、口碑以及专家意见解决。

惯例原则比较好地解释了高科技跨国公司不同生产环节的治理特点,如评价惯例和启发惯例通常在产品研发和设计过程中发挥作用,市场惯例和行业惯例通常在市场营销以及外包过程中发挥作用。以惯例分析为基础的治理理论容纳了更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等非经济因素,为全球价值链理论与碳排放、绿色治理、劳动力市场等研究相结合提供了启示。比如,长期以来消费者的作用被全球价值链研究所忽视,通过运用伦理原则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标准,消费者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角色被重新挖掘(Karimova, 2023)。此外,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挑战,学术界更加重视对绿色价值链的研究,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对绿色标准的界定和竞争

成为全球价值链治理研究的新焦点 (Fabiano 和 Daviron, 2024)。通过融入更多的惯例和标准分析, 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对新议题的解释力不断增强。

#### 四、制度赤字、产业竞争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顺利发展离不开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良好运转以及各国政府和企业对经济全球化的广泛支持。然而, 新冠疫情暴发以后, 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和发展遭遇重大挫折, 自由贸易的制度基础受到严重削弱。作为全球价值链最重要终端市场的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市场萎缩、消费下降、投资不足的不利局面。市场规模的萎缩限制了企业的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生产, 进而限制了分工的深化和价值链的延伸。

疫情促使跨国公司思考建立在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紧密经济联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重新审视其全球布局和风险管理策略, 通过更多的本地化生产和区域化生产减少对全球市场波动的依赖 (李向阳, 2021)。国家和企业对基于空间分布的区域价值链和本土价值链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亚太地区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于 2018 年生效, 北美地区的《美加墨协定》(USMCA) 于 2019 年生效, 跨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于 2022 年生效<sup>①</sup>, 世界范围内区域贸易协定的加速形成, 使得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安排被边缘化, 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制度基础的进一步弱化。

各国产业政策的博弈持续加剧。中国继续奉行扩大开放、扩大进口以及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政策导向。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核心的美国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对自身霸权地位的严重威胁, 其产业政策从重视市场效率转向重视产业安全 (贺俊, 2020), 随后采取了包括技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小院高墙”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限制中国分工地位的提升。中国的跨国公司也进入发展的分水岭, 随着大量中国高科技企业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 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全球扩张面临重重阻碍。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促进机制被打破, 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广化遭遇重大挫折, 全球价值链运转的基础受到侵蚀。

全球价值链进入亟待重构的新阶段。这既有国际分工自然演进规律的作用, 也有危机冲击期间“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更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 (戴翔和张雨, 2021)。在此背景下, 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开始从纯粹的经济分析转向政治经济学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安全与经济的关系、产业政策的竞争更多地进入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视野。一方面, 全球化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 大国竞争的本质转向产业政策竞争 (雷少华, 2019)。另一方面, 大国正在为争夺全球价值链枢纽和链接进行博弈, 把全球价

值链作为形塑国际权力的重要工具 (余南平, 2022)。中国作为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与其共同发展 30 年的最大发展中国家, 具有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深厚土壤, 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的影响如何, 中国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如何演变, 中国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日益体现出中国特色。

针对中国是否在全球价值链中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 有学者指出, 中国以初级要素以及利用外资融入全球价值链属于“低端嵌入”, 并不存在“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效应 (金京和戴翔, 2013); 也有学者从技术外溢的过度依赖、技术吸收能力以及发达国家的“俘获效应”等角度指出, 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后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吕越等, 2018)。尽管存在是否陷入“低端锁定”的争论, 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关键技术遭遇“卡脖子”困境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学者开始进一步研究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创新能力。包括刘志彪 (2015)、贾晋京和关照宇 (2020)、杨铭 (2023) 等在内的学者都强调了技术创新对中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作用。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 实现从中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升级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梦、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近年来, 中国学者在如何破除“低端锁定”、技术溢出如何实现、产业政策如何优化等方面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借鉴和引用国外理论成果逐步过渡到形成适用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国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开始脱离功能主义的国际视角, 实现了向锚定中国问题、体现中国意识的发展主义视角的重大转变。

#### 五、结论与展望

全球价值链 30 年的发展变迁与理论探索展示了其发展规律和内在动力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 制度变革的力量以及技术进步的力量共同推动全球价值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以产品内分工、FDI、外包为核心的生产组织方式分析成为研究重点。随着对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的重视, 以领先企业、惯例原则为出发点的治理结构分析占据主流。近年来, 全球价值链的宏观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 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制度作为曾经保障全球价值链高效运转的基础性力量正在成为限制性力量, 以国家与市场关系、安全与经济关系、产业政策竞争为主要逻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始崛起。随着自 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基础开始出现逆转,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发展也将进入新的阶段。

1. 大国博弈将成为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焦点议

<sup>①</sup>关于三大区域贸易协定的详细信息, 参见以下网站: <https://www.cptppcentre.org/zh>; [http://fta.mofcom.gov.cn/rcep/rcep\\_new.shtml](http://fta.mofcom.gov.cn/rcep/rcep_new.shtml);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

题。美国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将大国博弈作为内政外交的主线,拜上台以后,继续采取以“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逐渐抛弃了其建立和推动的一系列以促进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国际经贸规则。在全球价值链的制度基础被不断削弱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在政策上如何应对,特别是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的走向及其竞争将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重要内容。

2. 以 AI 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影响研究。近年来,制约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模块化生产模式已经无法为全球价值链的跨越式发展提供足够的内生动力。以 AI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引发传统生产要素以及以数据为核心的新生产要素的融合与创新配置,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基础或将迎来革命性突破。企业在投资、研发、生产、营销等领域对 AI 的应用将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提出新的挑战。

3. 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的关系研究。由于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发展缓慢、改革停滞等诸多问题,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迅速,与多边贸易协定形成正面竞争。包括 RCEP、CPTPP 以及 USMCA 在内的区域贸易协定涵盖了包括美国、中国、日本等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区域价值链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因此,区域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机制以及两者的未来发展趋势将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新议题。

参考文献:

- [1]杨丹辉,梁慎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及国际生产体系调整方向[J].经济纵横,2021(3):61-71.
- [2]张宇燕,时殷弘,王正毅,雷达,曲博,杨光斌,朱文莉,包刚升,等.笔谈:金融危机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J].世界政治研究,2019(01):1-49.
- [3]张辉.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05):38-46.
- [4]王金鑫.制造成本视角下中间品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03):112-115.
- [5]刘志彪,刘晓昶.垂直专业化: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和生产模式[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10):5-10.
- [6]卢峰.产品内分工[J].经济学季刊,2004(04):55-82.
- [7][英]卡普林斯基.夹缝中的全球化——贫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与发展[M].顾秀林,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 [8]秦升.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回顾与展望[J].国外理论动态,2014(12):14-21.
- [9]李向阳.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与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J].日本学

刊,2021(03):10-15.

- [10]贺俊.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J].学习与探索,2020(05):79-89.
- [11]戴翔,张雨.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中国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对策[J].China Economist, 2021,16(05):132-158.
- [12]雷少华.超越地缘政治——产业政策与大国竞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05):131-154.
- [13]余南平.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22(12):120-137.
- [14]余南平,戴翔.国际分工演进与我国开放型经济战略选择[J].经济管理,2013(02):1-10.
- [15]吕越,陈帅,盛斌.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J].管理世界,2018(08):11-29.
- [16]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J].学术月刊,2015(02):5-14.
- [17]贾晋京,关照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意义[J].开放导报,2020(01):26-31.
- [18]杨铭.人力资本结构、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攀升[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12):52-56.
- [19]Michael Porter.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M].New York: Free Press,1985.
- [20]Bruce Kogut. 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Added Chains[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85,26(04):15-28.
- [21]Gary Gereffi. 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How U. S. Retailers Shape Oversea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G.Gereffi and M. Korzeniewicz (eds.),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C].London: Praeger, 1993.
- [22]Grossman G, Helpman E, Lhuillier H.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Should Policy Promote Diversification or Reshoring?[R].NBER Working Paper,2021.No.29330.
- [23]Richard Baldwin,Rebecca Freeman.Risks and Global Supply Chains: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Know[J].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2022,14(01):153-180.
- [24]Ronald W.Jones, Henryk Kierzkowski. The Role of Services in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Ronald W. Jones and Anne O. Krueger,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E. Baldwin[C].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0.
- [25]Sven W. Arndt. Globalization and the Open Economy[J].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997, 8(01):71-79.
- [26]Boy Luthje.Electronics Contract Manufacturing: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J].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02,9(03):227-247.
- [27]John Humphrey,Hubert Schmitz.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Linking Industrial Cluster and Global Value Chain Research[R].IDS Working Paper,2000.
- [28]Gary Gereffi, John Humphrey, Timothy Sturgeon.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12(01):78-104.
- [29]Stephanie Schrage,Dirk Ulrich Gilbert.Addressing Governance Gap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ntroducing a Systematic Typolog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21,170:657-672.
- [30]Luc Fransen, Ans Kolk, Miguel Rivera-Santos.The Multiplicity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andard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J].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9, 27(4):397-426.
- [31]Stefano Ponte,Peter Gibbon. Quality Standards, Conventions and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Economy and Society, 2005, 34(01):1-31.
- [32]Guli-Sanam Karimova, Ludger Heidbrink, Johannes Brinkmann, Stephen Arthur LeMay. Global Standards and the Philosophy of Consumption: Toward a Consumer-Driven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J/OL].Business Ethics, the Environment & Responsibility,2023,Special Issue:1-15.
- [33]Flavia Fabiano,Benoit Daviron.China Reshaping Green Value Chain Initiatives: Between Global and Southern Standards[J].Third World Quarterly,2024,45(1):151-17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 30 Year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search: Theoretical Divergence and Policy Change

QIN Sheng

**Abstract:** In practice,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GVC) has been a vivid portrayal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ince 1990s, theoretically, GVC has promoted the major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becom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a ser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s.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s the significance of value addition and value distribution as the core concepts of GVC research, and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periods of GVCs in the past 30 years, includ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slow recovery perio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eriod of transfer to regional value chains after the pandemic. Policy practice at different stage has triggered the divergenc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analysis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ode with intra-product division of labor, FDI, and outsourcing as the core, the analysis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based on leading firms and convention principl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urity and economy, and industrial policy competition. The divergence of research paradigms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the technical and institutional basis of GVC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also reflect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GVC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GVC by Chinese scholars has shifted from a functionalis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o a developmentalist perspective that anchors China's problems and embodies China's consciousness, which lay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hina to better participat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GVC and addres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Keywords:** global value chains;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lead firm; industrial competition; institutional deficit